

芝翁高拜石著

古
春
風
樓
瑣
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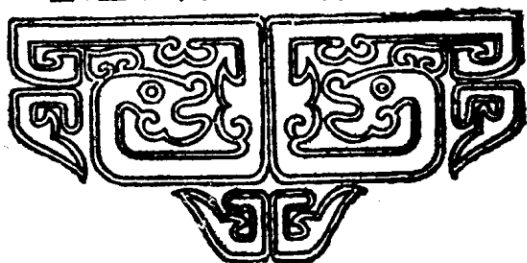
三
版

第十六集

169959

古春風樓瑣記

著遺石拜高・集六十第



行印起生新造台

古 春 風 樓 瑣 記

〔集六十第〕

著者：高拜石

發行人：沈岳

出版者：台灣新生報社

出版部

經銷者：台灣新生報社

讀者服務部

地址：台北市延平南路一二七號

電話：三八一三七九一（十線）

郵撥帳號：六二八八

印刷者：嘉信印刷廠

地址：台北市安西街二十九號

電話：五八一六八二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〇二八二號

全集二十冊

中華

華民

國民

國

六

十

年

六

月

三

十

日

再

版

（海外郵費另計）

精新美港

裝台

本幣金幣

全三八五

集千十百

訂元元元

價整整整

古春風樓瑣記 目錄

(第十六集)

經連珊其人其事.....	三
曾劫剛與其「中國先睡後醒論」.....	一一
廣雅書院與廣雅書局.....	二九
密勒醫生及其在華貢獻.....	三七
談鬱死魔窟的羅隆基.....	五六
談談陳公博的前半生.....	八〇
記尊重閣主趙尊嶽.....	一一一
共匪窩裏反的一段往事.....	一二三
四行倉庫孤軍魂.....	一三七
記一個堅苦卓絕的女獄吏.....	一四七
記奮鬥創業的僑賢張振勳.....	一五七

古春風樓瑣記

二

記共進會及其三個會長·····	一六三
溥儀的悲慘收場·····	一九六
項城高士袁孟昂·····	二四四
姚茫父的才藝與述著·····	二五〇
頤頤樓詩詞稿讀後漫記·····	二六六

經蓮珊其人其事

半粟編著中國六十年大事記：「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十二月：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儀爲大阿哥。自去歲八月後，盛傳廢立之說，人心洶洶，候選知府經元善，在上海聯合海外僑民，公電西太后，請保護聖躬，雖奉旨名捕元善，而非非常之謀稍寢。……」這就是晚清「己亥建儲」的一幕，惲毓鼎之崇陵傳信錄，以及近代諸家筆記，也均有述及，却語焉不詳，經元善之電，並無「請保護聖躬」，或「請收回建儲成命」，而經元善既不是所謂「滬商」，也不是「保皇黨」或「東南志士」，更不是用「候選知府」來領銜，他是用「上海電報局總辦」職名，與馬裕藻葉瀚章炳麟蔡元培吳朶唐才常丁惠康等一千二百三十一人聯名打電報給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發電的日子，爲己亥的十一月二十八日，電文如左：

「（上略）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日電旨，滬上人心沸騰，探聞各國有調兵干預之說，務求王爺中堂大人，公忠體國，奏請皇上力疾臨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皇太后之憂勤，下以弭中外之反側。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一位電報局總辦，竟敢作捋虎鬚的行動，他們明知道這慈禧皇太后決不會肯讓光緒帝力疾臨御，也決不饒這種妄干朝政的舉動，而偏偏要打這樣一封的電報去試試，他們這一些人的勇氣，是頗堪贊佩的！經元善是怎麼樣的來歷呢，宜爲一述：

經元善，字蓮珊，浙江上虞縣經家村人。經姓很罕見，姓氏考略說望出平陽；劉向說苑，魏有經侯，經氏當爲其後；晉代有經曠，明代有經濟、經承輔，自元善這驚人的一舉，史冊上才多了一個姓經的。經家村人多務農耕，元善的父親，名芳洲，早年便旅居上海，經營商業，好施樂善，曾在上海縣城創辦清節堂育嬰堂等諸善舉，人稱經善人。清同治元年間，太平軍二次攻打上海城，不及逃避的民間婦女，多投清節堂，得以不被凌辱保全名節的千餘人，忠王李秀成也聞芳洲之名，嚴令不許進擾。其後，太平軍侵入浙江，經過上虞經家村，說是經善人鄉里也相戒不許驚擾。事見上海及上虞兩縣誌。

元善自幼好學，好善亦如其父，讀書之暇，並留心時事，著有趨庭紀述。他父親死後，遺產約值五六萬元，光緒八九年，值山西疊遭水旱，災情慘重，元善即結束店業，帶了五萬多元，從上海乘船北上赴津，親至災區散放賑款，災民全活的甚多。自後每遇各省災旱，他便邀同紳富盡力籌賑，並發起協賑公所，募款達數百萬，以充救濟，地方官把他的善行層報

到北京，奉旨嘉獎達十一次之多，敍至知府，歸在江蘇候補。

◎

◎

◎

中國電信之開創，始於光緒五年李鴻章於大沽海口砲臺，架設電線達天津，是爲中國自設陸線之始。後以籌辦海防，南北洋必須消息靈通，以期無誤事機，飭由鴻章派鄭藻如盛宣懷劉含芳等，與丹麥大北公司訂立合同，代爲購料並查勘設線。自七年五月興工，共用銀十七萬八千七百兩。次年三月，改歸官督商辦，由商按期繳還官本。由盛宣懷南下籌劃，自蘇州浙江福建以達廣東，與兩廣方面粵商興造之陸線相接計程六千里，工本計銀四十餘萬兩。盛在滬與經元善洽商，元善即邀同蘇人謝家福鄭官應王榮和等湊集三十五萬兩湊入，着手興工，卽以元善任上海電報局總辦。

甲申以後，外侮紛乘，而朝廷墨守舊規，毫不知振作，元善平日留心中外政治，憂國之心倍摯。和朋友談起國事，輒多嘆喟。趙竹君（鳳昌）於光緒十五年自廣東調往武昌，經過上海，由友人介紹，與元善見面，談起來十分投機，成了密友，曾邀約他到鄂，籌辦織布局。

甲午年，中日戰起，自大東溝戰敗，至馬關議約，一般憂國之士，痛心國恥，康有爲梁啓超諸人都在上海，趙竹君這時也從武昌回來，和元善等也時與康梁討論，康梁主張應首從

上層政治着手，廢除八股，實行立憲，開制度局分辦新政，竹君和元善則主張應多辦學校，開通民智。元善尤主張先辦女學堂，因於康梁等北上之後，卽和趙竹君何眉孫（嗣焜）等聯名呈請總理事務衙門，准在上海開辦招生；並力佐何眉孫等建南洋公學於上海之清華鎮。滬上興學風氣，元善實具首功。

戊戌百日維新，由於康有爲諸人的衝動，與光緒帝的決心，終於在極勉强的情勢之下，見諸實行了，君臣們天真地想把舊勢力舊制度，以若干張詔旨一掃而光，便可立即從這古老腐敗的帝國，呈出嶄新富强的君主立憲國家，却不料怙權專斷的皇太后和頑固大臣們的反動，佈置得更周密，八月初六日突然起了大風暴，慈禧由頤和園還宮，見到光緒帝劈面就啐他一臉吐沫，恨恨地數說着，隨將他幽禁在中南海的瀛臺裏，隨用光緒的名義，頒下詔書。說是病了，經請皇太后垂簾訓政，已蒙皇太后允准，於是維新遠景，煙消火滅，舊派又抬頭了，所謂維新份子殺的殺了，罷免的罷免，康有爲徼倖先期出京，到上海時得到英國領事的幫忙，搭上外國船逃往香港，梁啓超也由日人之助，逃往東京，遂在海外合唱起保皇高調。

皇儲雖然定了，而皇位到底還得等機會，在慈禧及她的近臣們，只算遂了一半心事，但

她對外人的干涉不免愠怒在心。及接到經元善等一千多人的電報，中間有「探聞各國有出兵干預之說」的話，更是又氣又恨。氣的是外國干預，可能還要出兵？恨的是經元善以卑官末秩竟敢領銜發電，分明他的後面還是在外國庇護下的康梁在作祟。

原來，戊戌政變時，各省人士以光緒有志振作，遽被幽廢，甚為不懌，及廢立之舉，消息傳到上海，一般更感不平，經元善當時曾密電盛杏蓀（宣懷），請上言挽回，旋得盛氏覆電，僅一句話：「大厦將傾，非一木能支」。元善得電惶然，認為皇位已危，及聞建儲之詔，更證實了慈禧立溥儀為同治嗣子之後，繼之而來的，一定是再用光緒的名義下詔退位，這是廢立二重奏，慈禧一向以祖制來約束人，自己却先犯了，怎能使中外翕服？而那時的唐才常和章炳麟等確同情康黨，更是志切保皇，怎能不反對，他們揣知慈禧最顧忌的是外人，尤怕出兵干預，所以在電中加上這麼一句，用來嚇阻。

經元善的電報到達北京時，太倉唐蔚芝（文治）那時任總理衙門章京，恰值電報班，見了大驚，把電文呈給軍機大臣王文韶閱看時，曾請這位王大軍機，相機化解，免興大獄。王嘿然不語，說話間，榮祿也到了，把電文看了一遍，怒聲說：「這經元善是何等人，膽敢妄言干政，一定要把為首的殺幾個，看他們怕不怕。」這王文韶耳朵本不大方便，却不是全聾。

，至此見榮祿正在咆哮，假裝做聽不見，嘎嘎了幾聲，又啊了一聲：「經元善嗎？這名字我熟得很，他是大小兒的好朋友呀！」榮祿說：「老中堂快別提啦！經元善這小子現成了反叛了。」文韶把眼睛一瞪說：「反叛？經元善這人敢反叛？」榮祿說：「電報在此，怎不分明是要造反？」文韶又裝着糊塗說：「電報，那經元善不是在辦電報局嗎，許是別人冒他的名，想免付電報費吧！」榮祿見此老纏夾不清，便道：「這是何等事，那能以兒戲視之，一定要辦，要嚴辦！」這時其他軍機及章京等見二人大聲在說話，也附和着說：「要嚴辦！」文韶又作不解狀，朝着諸人癡笑。及召見時分，榮祿朝着文韶耳邊大聲道：「經元善案，一定要殺幾個，以昭炯戒，一會叫起的時候，老中堂奏對，要同一主張才好。」文韶把雙眉一皺，說：「立大阿哥是天大的喜事啊！殺人，不怕忌諱？老佛爺喜歡吉祥的，怕是不便吧！」榮祿改容說：「那怎麼好？」文韶說：「叫人把他抓了，關了起來，不就得了？」及奏對，慈禧果有怒色，文韶即奏：「經元善無知妄言，惟此風不可長，請嚴旨飭地方官拘捕監禁，以爲儆戒。」慈禧頷之，文韶出，即擬旨電發。

◎

◎

◎

經元善風聞京中要查辦的消息，急邀趙竹君諸人到電報局商量，竹君說：「立儲本違祖

制，內外大員，竟無一人敢言，乃待疏遠閒員，在野人士，突然電請，蓮珊兄可謂朝陽鳴鳳，足傳千古了。不過事隔許多天，沒有明旨，一定又在那裏搞花樣，不如避一避，免遭不測。」鄭陶齋在座，極以趙言爲然，力勸經元善到澳門看看一時，經乃於當晚乘葡輪赴澳。

元善走了之後，何眉孫旋得盛杏蓀自北京來電，略謂：經蓮珊事，言官有指係趙鳳昌袒護，將予一併彈劾，請轉詢竹君電復云云。何眉孫把電文給竹君看，竹君呵呵笑道：「我自湖北歸來，早已無官一身輕了，言官參我什麼，劾我什麼？這分明是盛杏蓀怕蓮珊跑了，希望不再幫蓮珊吧了，不管他！」遂不復電，復得京中友人告知：都下喧傳經元善事的時候，御史余誠格即參盛杏蓀，指經元善是盛用的人，應勒令交出，以憑訊辦。盛聽到消息，急了，一面電何眉孫，向竹君示意恫喝，一面上奏，說：經元善係臣奉旨辦理電政所用之人，康有爲乃余誠格之門生，余爲本身洗刷起見，故遽以誣攀。針鋒相對，樞廷諸臣，至此乃知余康關係，即將余誠格外放廣西簡缺知府，即日出京。趙竹君因嘆盛杏蓀巧於做官，立儲前所復致蓮珊之電，僅出一語，空洞驚人，惹起這一場公案，杏蓀於關係之際，措詞實欠斟酌了。

劉坤一奉召入京陛見時，兩江總督由鹿傳霖（滋軒）署理，一天，道員洪某叩命到上海

，先訪何眉孫，囑約趙竹君晤談。竹君如期往晤，一見之下，乃是洪琴西之子，琴西自三牌樓命案失察罷官後，調粵差遣，病死於善後局，竹君曾代爲料理身後，這洪道員憶起，便叫世叔稱謝。嗣述鹿仲希望竹君勸經元善回來，說明僅辦永遠監禁，決不至危及生命。竹君卽言：「我與滋卿本屬交好，可是在南京的褚伯約山長，及屬吏法公堂葛範夫，都是經的親家，何不託他們？再說此時人未到案，有何定讞？亦豈有勸一親友就獄，以候不測之誅？一旦嚴旨飭辦，滋卿也何能爲力？將來史筆大書：署兩江總督鹿傳霖殺經元善，似也不值得呀！如指爲康黨，蓮珊著有趣庭紀述刻本，中載有答康之信，責備甚周，足證不是康黨，書在此，請帶回南京，請滋卿再思之。」洪去後，自此寂然，但北京抓經不到，命將其家抄沒，竹君恐蓮珊在澳門，清廷或會叫李鴻章去引渡，又寫信託李幕之徐次舟（賡陞）勸李勿聽順中旨，徐向鴻章提及，鴻章說：「我才不做刀斧手呢！」此事遂成宕案，經安居澳門砲台，受葡人保護，庚子亂後，端剛獲罪，溥儀被逐出官，經元善由革命黨楊續泰保出，歸滬後不久遂卒。

曾劄剛與其「中國先睡後醒論」

清光緒十六年庚寅閏二月二十三日（公元一八九〇年四月十二日），湘鄉曾紀澤以感患傷寒促發舊疾的併發，死於北京臺基廠私邸，年五十一歲。其時他的職銜是：戶部右侍郎，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一等侯。清廷詔贈太子少保，照侍郎例給卹，加恩予諡「惠敏」，生平事蹟宣傳國史館立傳。翁同龢在這天的日記裏，記云：「訪劄剛問疾，則鼓在門矣，入哭，爲改遺摺。嗟嗟！此人通敏，亦嘗宣勞，而止於此，可傷也！」

紀澤字劄剛，曾國藩長子，襲一等毅勇侯爵，故當時多稱他爲劄侯或襲侯。李鴻章除輓以：「執別一句，何意竟成千載隔；抗稜四裔，此才方識九州難。」外，並專摺奏陳曾氏在外交上的各項成就，並盛稱他的學行，說：「少承家訓，劄志勵學，羣經俱有論述，於小學樂律，尤爲顯家，其餘力兼通泰西文字語言，更屬當代士大夫所罕有。」……他的體力原不甚健壯，在使歐時，便已多病，光緒十二年（一八八六）四月交卸使英事務返國，即入總署及海軍衙門辦事，他經常力疾赴公，不肯請假休養，四月五日（閏二月十六日）還赴戶部收

放銀兩，午飯後頭痛不止，遂病，前後八日，終以不起。李鴻章輓句中，故有執別一旬之語，於專摺中更述到「……猶憶閏二月十二日，臣在都會議朝鮮事宜，該侍郎力疾趨公，猶復長慮却顧，情溢於言，何意淹旬，竟聞永逝，歎其忠愛之忱，臨危不改，實爲國之盡臣，而無愧曾國藩之肖子。……」

俞曲園所爲「曾惠敏公墓志銘」謂：「醇賢親王親臨哭奠，謂年甫及艾，何遽至此，有其才而不竟其用，惜哉！昔日之間，電傳中外，無不同聲太息，爲朝廷惜此柱石之臣，嗚呼，如我公者眞我國家之盡臣，而我師文正公之肖子矣。」可見劄剛之突然逝世，不論公私，無不深致悼惜。

曾劄剛自光緒四年戊寅（一八七八）之秋，奉詔以一等毅勇侯候補京堂的崇銜，繼郭嵩燾充出使英法欽差大臣，冬初卽搭法國商輪從上海啓程赴歐，一八七九年一月，先抵巴黎，覬見法總統麥馬洪，呈遞到任國書，次卽赴英，覬見英女皇維多利亞，呈遞到任國書，卽駐倫敦，庚辰年（一八八〇）春，清廷以崇厚在俄辦理伊犁事件不善，革職鞫問，詔命兼爲出使俄國大臣，夏由英赴巴黎轉往俄都聖彼德堡，在俄交涉八個多月，始返巴黎再轉倫敦，壇坫週旋，折衝樽俎，尤其辦理中俄伊犁交涉，費唇舌者半載有餘，「反覆辯論至數千萬言」

，「釁將開而復弭」，最爲朝野所稱許，他在外九年，勞瘁備至，至光緒丙戌（一八八六）始歸，四十開外的人，已鬚髮皆白了。

◎

◎

◎

中國遣派使節，駐在歐美日本等重要國家，始自光緒初年，第一任駐英法爲郭嵩燾，繼之者即爲曾紀澤。嵩燾以通曉洋務自負，要介紹國外知識，以改變國人一向以天朝人物的夸大觀念，不幸却得不到當時人的根本了解，且遭到重謗，紀澤以名父之子，又幸賴有這位世交前輩，先負其謗，得以差全其名，更因他爲當時出使大員中，第一個懂得外國語文的人，一時對他有「閩中博外，體用兼賅」的美稱。左宗棠和郭嵩燾不洽，對曾則極寬稱道，有「奉命出使，於交涉事件，隨事執中，寬而有制。內則成乃父未伸之志，孝不違親；外仍慎與國邦交之義，志殷補復。」之語。對於他在外交成就來說，伊犁交涉的成功，對法備戰謀和的主張，對英協議洋藥稅厘併徵等等，美史家摩斯Hosea B. Morse曾贊他「爲中國不流血的外交勝利，開荆先例」。他比郭嵩燾幸運多了，而事實上他也確是做了更多。

紀澤之續略行事，具於金紹籌筆的日記與後人所輯之曾惠敏公集中，尚有「中國先睡後醒論」(China, 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發表於一八八七年（光緒十二年冬）

一月號倫敦之「亞洲季刊」，(The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 頗傳誦中外，當時上海同文館之顏詠經與袁天一，曾譯成中文，而文集中沒有收入。揆其動機，應是他在駐歐八年間，耳目所接，深以西方各國朝野，對於中國政教的誤解，和多方覬覦中國屬土的野心，審度當前內外情勢，非那套龐然自大水來土擋的洋務方針，所能挽救；因就中國的現狀與將來，向歐洲人士有所表白，一方面希望西方各國歷來對中國蔑視和一貫蠻橫的態度有所改變，一方面更希望由此發動外國的輿論，對中國的處境予以同情。文中，他嚴斥西人對這東方大國，已經由衰老而趨於死亡的謬見，並辯釋中國只是暫時陷於酣睡狀態，絕非精力耗散，完全不堪救藥可比。是一篇為國宣傳之作，同時也宣示了當時中國之外交方針，如云：

「國與人無異，人有幼年、中年、老年、一息待盡之年，國亦有之。歐洲之遽謂中國即一陵夷衰微終至敗亡之國。蓋彼見中國古所鑿之洪流巨川，四通八達者，今多湮塞；昔所傳金石土木之工，堅緻鉅麗，今祇存遺迹，剝落損壞，無復完美，且作法多有失傳者。中國古昔之盛，與近今之衰，判若霄壤，遂疑中國精力業已銷鑠殆盡將近末造，難與他國爭勝之勢。……」